

# 胡乔木传

胡乔木传编写组 著

(下)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人民出版社

# 胡乔木传

（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胡乔木传

(下)

胡乔木传编写组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人民大学出版社

## 第二十二章

# 再次挨整与复出

### 转信引起大变故

1975年11月4日，邓小平把胡乔木找去，谈《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谈完以后说：你们以后就抓两件事：一件是把编辑《毛选》的工作做好，一件是帮助学部把刊物办好。胡乔木这时还不知道，毛泽东对邓小平为刘冰等人转信的事作了严厉批评；政治局内在11月2日已开会“批邓”；11月3日吴德已经到清华大学传达主席的批示，布置展开大辩论。但胡乔木从邓小平对政研室工作大收缩的部署中，预感到转信引起了大变故，形势发生了逆转。

过了一个星期，11月10日，邓小平又约胡乔木到他那儿去，告诉胡乔木：我现在受批判，起因是转刘冰的信。主席作了很严厉的批评，我作了自我批评。邓小平说：信既要我转，总是说明写信的人认为我是同情他们的。<sup>①</sup>

邓小平说的是实话。清华大学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等四位负责同志于10月7日联名写的信，抬头是“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信中揭露迟群、谢静宜<sup>②</sup>在清华大学的严重问题，特别是揭发迟群在中共十大和四届全国人大后，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部长而发泄对毛主席、周总理的不满，以至公开攻击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等事实。这封信经教育部副部长李琦交给胡乔木，胡乔木即于10月13日夜间把它送到邓小平处。当时邓小平不在家，由秘书收下。两个月前，邓小平曾把刘冰

<sup>①</sup> 据《胡乔木传》编写组编：《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

<sup>②</sup> 迟群，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1978年被北京市公安机关逮捕，1983年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谢静宜，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1976年10月后，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1977年8月，被北京市公安机关逮捕，因坦白认罪较好，免于起诉。

等四人8月13日另一封写给“小平同志转呈主席”反映迟群政治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风方面问题的信转呈毛泽东。这第二封信同样照转不误。当时，教育领域的整顿正要全面展开，邓小平希望此信有助于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并推动教育整顿。万万没有想到，此举会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快。

1975年10月19日晚上，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同李先念、汪东兴谈话，对邓小平转呈刘冰等人的信进行严厉批评。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过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sup>①</sup>

毛泽东把刘冰等人来信反映清华大学迟群、谢静宜的问题，同对自己的态度联系起来，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胡乔木听邓小平说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后，沉思片刻，对邓小平说：转信的事恐怕不是主席批评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一定是主席对你早就有了不满。邓小平点头，说：过去把形势看得太简单了。<sup>②</sup>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当然不单由转信这一件事引起。事实上，当邓小平主持1975年整顿，涉及批评、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方针、政策和思想理论，特别是涉及批评、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科技等领域里的一系列变革，毛泽东内心已有不满了。这次只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诚然，毛泽东抓住转呈刘冰等人来信这件事，表明对邓小平主持整顿、否定“文革”的不满，还有事情本身的特殊性和引发事件的一些偶然因素。

胡乔木知道，清华、北大是毛主席亲自抓的点，那里的工宣队是毛主席派的，容不得随便非议。政研室成立之初，胡乔木布置过教育方面要对教育质量、学习时间、基础课和毕业生水平等作调查。那时，他就了解到，清华大学的系科、专业搞得很乱；迟群多次鼓吹，清华所有的系科，第一专业都是斗“走资派”。胡乔木很不满，讲到这件事时，李鑫就跟他说：清华、北大的事，你可不要插手，这是毛主席亲自管的。<sup>③</sup>在8月21日“读文件”时，邓小平讲到刘冰等人8月13日给毛主席的信，说：清华有人告迟群发酒疯，你

<sup>①</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页。

<sup>②</sup> 据《胡乔木传》编写组编：《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

<sup>③</sup> 据《胡乔木传》编写组编：《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们知道么？我把他们的信转给毛主席了。胡乔木当即问：北大、清华现在谁管？邓小平说：市委管嘛。胡乔木因前已听过李鑫的告诫，就提醒说：北京市委怕管不了，教育部也不会管得了，要管还得由主席管。可能有些具体事情主席不知道，有机会把北大、清华的有些情况向主席反映反映，北大、清华的领导问题才能解决。<sup>①</sup>邓小平、胡乔木正是本着想要让毛泽东了解情况以便解决清华的领导问题的愿望而转呈信件的。

毛泽东对“转信”作出这样过度的反应，还同当时发生的两件事有关。

其一，9月27日，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因赴乌鲁木齐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来北京，同他谈了不少对邓小平主持工作、进行整顿不满的话。毛远新把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尖锐地提出来，说：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毛远新的这些极富挑拨性的话，使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产生了动摇。

其二，毛泽东对《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不满。10月14日，邓小平向胡乔木讲了毛泽东日前同他谈话的情况。邓小平告诉胡乔木，主席讲他没有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对《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有一些不赞成的意见。胡乔木把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指示的十个方面编集在一起，来说明毛主席的科技路线，毛泽东也不满意。这十个方面的语录全部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没有一条“文化大革命”中的指示。

刘冰等人的来信于10月14日转达毛泽东的案头之时，正好是在毛泽东听过毛远新的谈论、特别敏感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又刚看过《科学院汇报提纲》颇为不满之际。对刘冰等人的信、对邓小平转信的行动，作出这种不切实际的、过于严厉的批评，自有其逻辑的必然。

不过，这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一批二保”，立足于帮。

形势的进一步逆转，是在毛远新11月2日向毛泽东再进谗言以后。

毛远新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后回到北京。11月2日上午，在毛泽东面前大谈对形势的看法，歪曲事实，攻击邓小平。毛远新再一次尖锐地提出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认为今年以来，

<sup>①</sup> 据胡乔木1976年2月23日的检查、3月2日给毛泽东送的材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16期、第18期、第19期、第32期。

“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毛远新又谈论对1975年工作的看法。他不仅否定各方面经过初步整顿取得的成绩，而且认为1975年整顿路线有问题。在对整个形势非议之后，毛远新直接谈他对邓小平的看法。毛远新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有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还说：“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毛远新把问题提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外面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泽东同意毛远新的这些看法，并由此谈到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sup>①</sup>毛泽东让毛远新看清华大学刘冰等人8月和10月先后写的两封信，并把他关于刘冰来信谈话的记录稿念给毛远新听。

毛泽东要毛远新找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谈一下，把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要毛远新帮助邓小平提高。就这样，毛泽东作出一个重要决定，在政治局内一个小范围里开会批评邓小平，毛远新参加。这次谈话，是毛泽东从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整顿，改变为批评邓小平以至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一个转折点。

11月2日当晚，毛远新召开四人小会。会上，邓小平同毛远新就1975年的形势和整顿的评价问题进行了争论，邓小平理直气壮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对这一场争论，毛泽东支持毛远新，说：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毛泽东指示继续开会，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八个人先讨论，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作出总的评价。他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 打倒一切，2. 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sup>②</sup>

<sup>①</sup> 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7页。

<sup>②</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页。

毛泽东要求八人会议抓住当前两条路线斗争，集中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以他的这个结论为基础，对“文化大革命”作个决议。

11月7日政治局第二次八人会议后，得到毛泽东同意，指名批评的对象扩大到胡乔木和胡耀邦、李昌、周荣鑫这几位在宣传理论和教育、科技、文艺等领域积极支持邓小平整顿的领导同志。会议的范围也扩大到17人，包括健康状况能够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

1975年11月13日，毛泽东指示，就当前两条路线斗争问题要向包括胡乔木在内的领导干部和一些老同志“打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11月14日，邓小平和三位常务副总理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在国务院召集胡乔木和胡耀邦、李昌、周荣鑫开会，通知他们政治局日内将开会谈他们几个人的问题，要他们做准备。<sup>①</sup>这之前，胡乔木他们几人已被找去听了毛泽东对刘冰等来信的批示。

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开十七人会议，批评邓小平，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和向一些同志“打招呼”的问题。胡乔木等几人也被通知参加。在这次会上，胡乔木作了检讨，谈了他把刘冰等人的信转送邓小平的经过。江青把胡乔木训斥了一通，说你胡乔木对毛主席忘恩负义！

11月24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议。全体在京政治局委员、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共一百三十多人出席。政研室到会的是胡乔木和吴冷西、胡绳。会议仍由邓小平主持。他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宣读之后作了几点说明。

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要求在省部军级领导干部中传达讨论。1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向全国发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信号。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就这样在全国开展起来。胡乔木既然是邓小平进行整顿的参谋和助手，自然是“反击”的重点对象。

胡乔木又一次处在“运动”的炼狱中，在追逼交待和无情批判中，强撑苦挨度过难熬的岁月！

<sup>①</sup> 据胡乔木1976年3月2日写的一份材料。



## 在巨大的压力下

胡乔木等出席 11 月 24 日“打招呼”会议以后，就召集政研室七位负责人开会传达。按照中央 26 日通知，首先在七个人范围内讨论贯彻，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经七个人讨论后，再在政研室干部中传达。

运动刚开始，对胡乔木的批评就非常厉害。最尖锐的是李鑫，也有几个人跟着李鑫的调子说话。李鑫有一次在会上对胡乔木大发脾气，说：叫你来编《毛选》，说是协助我的，结果变成你为主了。其实，胡乔木本来就邓小平、康生三人是毛泽东批准的《毛选》工作小组的成员，李鑫只因是康生的秘书而参加《毛选》的编辑工作，不存在胡乔木抢他权的问题。李鑫还说胡乔木对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一窍不通，甚至出粗口骂胡乔木“是什么玩意儿”。

面对这样一些无理指责和批判，胡乔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内心非常痛苦。有一次散会后，人都走光了，会场上就剩下胡乔木和邓力群两个。胡对邓说：想不到啊，过去多年的老朋友，遇到现在这种局面，就这样对我。

1975 年冬至 1976 年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逐步推向高潮。“四人帮”一面亲自出马，罗织罪名，诬蔑国务院政研室“是一个相当大的谣言店”“邓记谣言公司”“右倾翻案风的黑风口”“继旧中宣部后又一个阎王殿”，在报刊上不指名地攻击胡乔木等政研室负责同志是“邓小平的谋臣”“邓记班子中的‘理论家’”；一面插手政研室的运动，扶植政研室内自愿充当“钉子”的人，从内部发难，制造了七次所谓大的揭批高潮，企图整垮胡乔木等人，并从此打开搜集邓小平等领导同志黑材料的缺口。胡乔木首当其冲，成为追逼交待的重点，承受着里应外合、内外夹击的政治高压。他不能不应付，甚至不能不做一些检查交待、揭发批判的文章，但总的说来，他经受住了考验，没有被压垮，没有让“四人帮”的阴谋得逞。

历次政治运动中总会有人跳出来，当“积极分子”，以“打人”为能事，投运动之机，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四人帮”在政研室找到的一个“钉子”，是从新华社调到政研室资料室的农伟雄。他于 1976 年 2 月 7 日给姚文元写了一封长信，揭发胡乔木和政研室的“问题”。这封信正中姚文元下怀。姚即给农回信，说希望你再把什么问题写一下，告诉我。农伟雄第二封

信没有写给姚而直接写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给了政治局，也发给政研室一份。农伟雄就此以通天人物自居。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1月下旬，毛泽东提议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工作，中央遂于2月2日正式发出通知。2月25日，华国锋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由毛远新整理的又一次“打招呼”，要求认真学习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毛主席重要指示》，要求“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政研室出席这次“打招呼”会的，除胡乔木外，还有农伟雄。在会上，江青、姚文元见到此人，当着胡乔木的面对他说：你的信写得很好，应该把运动搞起来。还说：你的任务就是搞揭发。

会后没过几天，经请示国务院，政研室成立了一个运动领导小组，胡乔木名义上还是组长，实权掌握在副组长农伟雄手里。他对胡乔木说，你要交待问题，一些会议、活动我来主持。农伟雄与另外三个人一起，在政研室形成“三少一老”掌权的局面，兴风作浪。他们先是揭发、追查“政治谣言”；然后是集中揭发邓小平；接下来是揭发、批判“三株大毒草”，特别是政研室写的《论总纲》。在每一次揭批高潮中，胡乔木都是众矢之的。农伟雄不仅通过简报、通过姚文元派来的新华社记者这些途径送材料，还私下里分别给“四人帮”写信。<sup>①</sup>姚文元在新华社两次赞扬农伟雄，说农材料整得好，从打招呼会议后，政研室的简报给他提供了很多材料；还说农在你们这里默默无闻，可是到了政研室起了很大作用。政研室有了这个投靠“四人帮”的“钉子”，胡乔木等人的日子之难过就可想而知了。

在“批邓、反击”的日子里，胡乔木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最使他感到为难而无法绕开的是，一些同志将他同邓小平每次见面的时间排列后加以揭发，造反派据此勒令他交待邓小平每次都议论了什么。一点不说吧，反映上去毛主席会不满意；照实说吧，邓小平无疑会遭受更大的打击。于是，他采取的策略是重点交待自己的“错误认识”，涉及邓小平的，则主要讲一些不痛不痒、无关紧要的事。正因为如此，他每一次交出的检查，得到的回答都是说他不老实，避重就轻，说小不说大，说明不说暗，说虚不说实。<sup>②</sup>胡乔木

<sup>①</sup> 1976年7月2日农伟雄给张春桥写信，9月4日给姚文元写信，9月17日给江青写信。

<sup>②</sup> 据1976年3月2日，胡乔木致毛泽东信。

讲了1975年一年间为编辑《毛泽东选集》和商量政研室的工作同邓小平的接触、交谈的情况，大致按时间先后叙述了事实经过。但是，邓小平同他二十多次交谈中说的批“四人帮”的话，一句也没有涉及；除邓小平外，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一个也没有涉及；对他的下级，即胡乔木领导下的政研室其他六位负责人，也一个都没有涉及。当时不能不作的对邓小平的批判，都按《毛主席重要指示》来进行，没有采用当时报刊“批邓”文章的提法，更没有自己创造发明的上纲上线的语言。

对于那些被指责为问题严重的事情，胡乔木一点也不推诿，而是说明真相，承担责任。如：“四人帮”诬蔑《论总纲》是“三株大毒草”的“主体”，是“一篇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妄图把《论总纲》说成邓小平授意写的，作为打倒邓小平的炮弹。在巨大压力下，主持起草《论总纲》的邓力群多次主动表示：《论总纲》这篇文章是由他负责并口授写成的，起草过程中没有就文章内容同胡乔木交换过意见。三次稿子中的每个观点、每个提法和每句话，都由他一个人负全部责任。对此事，胡乔木也主动承担责任，郑重声明写此文并非邓小平布置，完全出于自己的主动，是我布置邓力群他们写的，也未向邓小平谈过。文章正在写作过程之中，也没有送给邓小平看过。

胡乔木、邓力群都是有担当的人。“四人帮”想从他们那里逼出整倒邓小平的“尖端”材料，终究落空。

毛泽东看了胡乔木3月2日写的材料，写了一句批语：“送政研室一份，交乔木同志。”

毛泽东对胡乔木的揭发材料作出批示后不到半年，就在9月9日与世长辞了。其时，“四人帮”在全国发动了对所谓“三株大毒草”的批判。他们把《论总纲》《工业二十条》《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三个文件加上他们的批判文章印成三本小册子，发行了几千万册，发动全国批判。“邓小平的谋臣”“邓记班子中的‘理论家’”成为胡乔木的代名词。

毛泽东去世后，他的遗体先安放在人民大会堂。毛泽东的战友和学生，干部和群众代表，前往瞻仰遗容，同遗体告别；不仅北京的，而且在全国各地的都通知前来；就连政研室的所有人也都去了，惟独不准胡乔木参加。党、军队和国家领导人还轮流守灵，中央机关的负责人也都参加守灵，胡乔木却被排除在外。胡乔木从1941年2月到毛主席身边，跟随主席、领受主席教诲三十多年。“文化大革命”中胡乔木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还亲自上门去看望

他。胡乔木对毛主席情意之深挚，非常人所能体察，而在这最后一刻，竟不能到他身边，向他致最后的敬礼，作最后的告别！这当然使胡乔木极为痛苦。他想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万般无奈之中，找邓力群商量，说：我在主席身边工作几十年，不管怎么样，我希望有个机会跟主席告个别，可是一直不准，怎么办？邓力群建议他向上面写封信。后来，胡乔木就写了一封给中办主任汪东兴转江青的信。<sup>①</sup>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封信不仅没有起作用，相反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又被某些人作为继续打击胡乔木的证据。

9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追悼大会，正式通知中央机关每个单位可以推举两位负责人上天安门临时搭建的大台子，政研室推举胡乔木和邓力群。正式报告上去，也没有批准。邓力群和大家一起站在广场上参加了追悼大会，胡乔木连参加追悼大会的资格都没有！

### 粉碎“四人帮”后的委屈

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地粉碎了“四人帮”。消息传出，被“四人帮”压制的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人们，都为重新得到解放而欢欣鼓舞。全国上下，欢庆十月的胜利。北京百万军民，游行三天。胡乔木一直受江青欺压，同张春桥长期形同水火。早在1975年9、10月间，胡乔木就曾在中南海汪东兴的办公室向汪说，江青他们有野心，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透露了他们的野心。他还送了一套《学习与批判》杂志给汪东兴看，建议先把张春桥“搞起来”。汪东兴回答，搞一个人不行。<sup>②</sup>

可是，粉碎“四人帮”后，胡乔木的处境并没有多少改变，只是用不着再检查交待了。在政研室内，农伟雄是直接同“四人帮”勾结的“钉子”，揭发批判他的小帮派自然成为政研室内运动的重点。从10月27日起至11月初，政研室连续开了五次会，揭发批判“四人帮”，同时开始提出清理农伟雄小帮派的问题。胡乔木在名义上担任临时领导小组组长，实际工作由邓力群

<sup>①</sup> 据邓力群回忆。

<sup>②</sup> 据《访问汪东兴同志纪要（经汪本人审阅）》（1984年5月31日、6月13日、6月15日），打字稿复印件，第23页；范硕：《叶剑英在1976》（修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页。

领导的“揭、批、查”办公室负责。胡乔木表示，运动的事情他一般不管，他要多花点精力帮助起草和修改重点文章。

新的一年开始，使胡乔木感到委屈的事情却又接踵而来。

首先是政研室的七位负责人分成了两半。1977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成立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委会下设办公室，作为编委会的办事机构，同时又是党中央起草文件的工作部门。李鑫和吴冷西、胡绳、熊复都被正式任命为编委会办公室的副主任，胡乔木却被排除在外。1977年1月24日，李鑫找胡乔木谈话，给他戴了一顶很重的帽子，说：你秉承邓小平的意思，篡改毛主席的著作，不宜继续参加毛著编辑工作，调回中办。我今天只是口头通知，将来有正式通知发给你。

这时，政研室接到国务院政工组的通知，说中央决定撤销政研室，工作人员重新分配工作，要他们做好善后工作。胡乔木对这种局面深为忧虑，几次对邓力群说：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重新组织理论队伍，好不容易把研究室搞起来了，现在又一分为二了。剩下的人等于是一个个细胞啊，如把这些都搞掉了，以后就难办了。保留这些个细胞，以后就可以不断分裂，理论队伍也就可以重新组织，不断扩大。

邓力群感到，胡乔木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受压，粉碎“四人帮”后还是受压，这是不公正的。邓力群认为，胡乔木过去为毛主席做了许多工作，在1975年整顿中又为邓小平做了不少工作。他在这方面的才干，没有别人能代替得了。另外，他也赞同胡乔木的意见，认为政研室的队伍不宜轻率解散。于是，他一方面找陈云、王震谈了胡乔木的情况，取得了他们对胡乔木的谅解；另一方面，尽可能找各种理由，拖延政研室的撤销时间。陈云把胡乔木请到家里谈了一次话，对他又是批评又是鼓励。王震还到叶帅那里去谈，说明事情的真相。许多老同志如李先念、陈锡联、余秋里、罗瑞卿、胡耀邦等知道情况后，都表示理解。

## 邓小平的评价

最重要的，当然是邓小平的态度。

1977年5月下旬，邓小平让王震和邓力群到他那里去。这时，邓小平要再次出山、恢复被免去的所有中央领导职务，已经明朗化。王震是个大事情

明而又敢作敢当的人。他认为小平同志出来重新工作，要有个笔杆子，于是让胡乔木写封信，向小平同志认个错，由他们带去面交邓小平。

5月24日，王震和邓力群去见邓小平。邓小平同他们就当时面临的各种问题谈了许多重要意见。关于胡乔木的问题，也是这次谈话内容之一。

王震说：乔木有个自我批评的信，让我们带给你。他说自己犯了错误，很对不起你。

邓小平说：这没有什么，对这事我没有介意。还特别交代：不必写信或写自我批评了。要乔木同志放下包袱，不要为此有什么负担。

邓小平说：乔木3月2日写的那个材料我看了。没有什么嘛。其中只有一句话不符合事实，他说那次我发了脾气。实际上那次我并没有发脾气嘛。说到批我么，不批也不行嘛。当时主席讲话了，四号文件发下来了，大家都批，你不批不是同主席唱对台戏？批我厉害得多的人有的是，有的甚至说我五毒俱全。至于揭发我说过的话，那就更没有什么问题。我过去这样讲，我现在仍旧那样讲。比如台阶论，最近我就对华主席讲，还是要讲台阶论。青年要积累经验，这是培养青年的好办法。不用这个办法反而把好好的青年人害了。

邓小平对胡乔木作了肯定的评价，说：乔木是我们的第一支笔杆。过去党中央的很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毛主席尽管对他有批评，可是一向重视他。有几个人联合起来反对他，结果主席没有办法，只好不用。

谈到整理《毛选》五卷，邓小平说：《论十大关系》这篇是谁整理好的？这事我可以作证，是乔木同志主持，整理了好几稿才搞成。在这以前搞了好几遍都不行。这次文字上下的功夫不少。整理后的文字，理论、逻辑很严密，成了一篇理论文章，哲学文章。《论十大关系》是《毛选》五卷新发表的文章中最重要的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已早发表了。这篇是新发表的。

谈到胡乔木的缺点，邓小平说：他这个人缺点也有。软弱一点，还有点固执，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同那些看风转舵的不同。

邓小平说：总而言之，乔木这个人还是要用。至于怎么用，做什么工作，要找同志商量、交换意见。政研室的事（指政研室要撤销——作者注）以后再说，反正有用的人总还是要用就是了。邓小平叮嘱邓力群：请你告诉乔木同志，要解除包袱，不要再把这事放在心上。



谈话涉及“三株大毒草”，邓小平讲了自己的看法，实际上作了结论。他说：“三株大毒草”中的《论总纲》，我确实是最近才看到的。文章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香花，不是毒草。《汇报提纲》，当时想争取通过，但没有能做到，有些问题现在要进一步写。《工业二十条》，看过第二稿，以后的稿子没有看过。这些文章也有缺点，没有缺点的香花我看是没有的。<sup>①</sup>

邓小平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他对胡乔木的宽容、谅解，对胡乔木的全面分析和充分肯定，使胡乔木又一次走出逆境。

---

<sup>①</sup> 邓小平5月24日与王震、邓力群的谈话，引自邓力群的记录，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

## 第二十三章

# 再次复出之后

### 主持新版《鲁迅全集》注释

正当王震同邓力群酝酿使胡乔木能够重新出来工作的时候，1977年“五一”劳动节后刚刚上任的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王匡已经找上门来，恳请胡乔木主持《鲁迅全集》新版的注释工作。胡乔木欣然同意。

编辑、出版一部比较完备和准确的新的《鲁迅全集》注释本，胡乔木一直大力支持。前面已经说过，1975年10月，周海婴就鲁迅书信、著作的编辑出版问题上书毛主席，信稿就是得到胡乔木的指点，经过胡修改、润色，并由胡转呈毛的。毛泽东作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要求政治局讨论“作出决定，立即实行”的批示，鲁迅书信集的出版再也无法阻挠，《鲁迅全集》的整理和注释也一变过去“一直无人过问”的状况。

不过，《鲁迅全集》的注释、出版工作任务还十分艰巨。对出版管理部门来说，这项工程是重中之重。所以，王匡上任伊始，就登门拜访老领导，请当时尚未出山的胡乔木来主持这项工作，主要是掌握方针和定稿。1977年9月11日，出版事业管理局向中央写了《关于鲁迅著作注释出版工作的请示报告》，表示决心力争在1981年鲁迅诞辰100周年时将新注《鲁迅全集》出齐。报告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无人定稿。而鲁迅著作注释的定稿工作，涉及面广，影响重大，须得具有相当政治水平和文艺理论水平的同志才能胜任。为此，请示报告提出建议：请中央批准胡乔木同志分出部分精力来过问一下这项工作，主要是掌握方针和对注释中的重大问题加以指导和审定；约请郭沫若、周建人、沈雁冰、王冶秋、曹靖华、李何林、杨霁云、周海婴同志担任鲁迅著作注释工作的顾问；请调林默涵同志（现在江西等候分配工作）来协助胡乔木同志主持具体工作。华国锋11月12日批示“拟同意”，邓小平、

李先念、汪东兴均圈阅同意。

12月20日，王匡即将中央批示件函奉胡乔木，并告“默涵同志明晚返京”等。这时，胡乔木已经恢复工作，一方面继续主持国务院研究室，一方面被任命为刚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同时，拨乱反正过程中的一些重要文稿由他主持撰写或请他修改定稿，工作十分繁忙。但中央还是同意由胡乔木分出部分精力来过问这项工作。

对胡乔木担当主持《鲁迅全集》注释工作这项重任，茅盾非常信任和赞赏。他在致周而复的信中谈及鲁迅著作的注释工作时写道：“盖注释中争议也不少，非乔木同志主此事而默涵等实际负责，将不能妥善解决也。年来以鲁迅为招牌，摘取片言只语，对某某事件作夸大解释者，实在不少。此亦‘四人帮’形而上学影响之一事也，非有霹雳手<sup>①</sup>不易摧枯拉朽也。”茅盾以“霹雳手”称许胡乔木，赞扬他出手迅速，处事果断，能够一锤定音。

胡乔木非常重视《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工作，为此倾注了心血。根据胡乔木的意见，经国家出版管理局同意，成立了“鲁迅全集领导小组”<sup>②</sup>，具体领导鲁迅著作编辑室的工作。《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随即在胡乔木的指导下紧张而有序地开展起来。

首先是重新明确注释、整理和出版工作中有关方针性的问题。对此，鲁迅著作编辑室向胡乔木递交了请示报告，提出意见。胡乔木于1977年12月20日同林默涵等谈话，就《鲁迅全集》注释工作作指示。<sup>③</sup>

胡乔木表示同意请示报告所提各点，谈了一些重要意见：一、对有关30年代文艺运动的几个问题：两个口号论争，关于“四条汉子”以及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要趁当时有关的人如郭老、茅盾、夏衍、周扬等健在，把有关事实查对清楚，赶快写出一个注释稿子来。二、文中或书中提到的人和事，有些与事实不符或传闻失实的，要查对清楚，加以说明。对一些人物（如顾颉刚、冯雪峰等）如何注释，要筛选一下，有些要报中央。三、为什么不作“题解”，因为对一个作家的作品，本来可以有不同的探讨和

<sup>①</sup> “霹雳手”，典出《旧唐书·裴崔传》。裴做同州司户参军，刺史因他年轻而瞧不起他，故意将积存的数百件旧案交他速办。裴挥笔断案，迅速办完，判词允当。由此大大出名，被称为“霹雳手”。

<sup>②</sup> 林默涵任组长，组员为冯牧、秦牧、王仰晨（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李文兵（鲁迅著作编辑室副主任）。

<sup>③</sup> 以下胡乔木指示内容均据林默涵的记录稿的复印件。出版局收文3329号（1977年12月21日）。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编辑室提供。